

东京审判80周年

战败者如何书写历史

陶赋雯注意到，战后日本，一开始有“公职追放”，将一些战犯、战争期间有过错者进行“隔离”，亦即不允许他们从政。但过不多久，如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竟然能重返政坛，甚至出任日本首相。

“日本政府对侵略责任的认定，始终暧昧不清。”陶赋雯说，“其甚至反而系统性地构建一个以‘终战圣断’‘世界唯一核爆受害国’‘和平国家’为核心的三重历史叙事，将日本战败转化为‘拯救日本的必要之举’，并通过强调广岛长崎曾经受到过原子弹轰炸，将自身从‘加害者’叙事置换为‘悲剧的加害者/唯一核爆受害者’的复杂身份，以此掩盖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。”

陶赋雯注意到，同样是战败者，德国的情况大为不同。战后，其曾经专门设立基金，来赔偿曾经被纳粹征用的劳工。其中包括波兰、乌克兰等国劳工。哪怕赔偿金额并不高，但哪怕“赔偿一马克”也是一种态度。而日本则不同，其拼命抵赖战争罪责。陶赋雯曾撰文《“军舰岛”的国家记忆生产与政治——鉴于战争“负遗产”视角》。其中提到二战时期日本长崎“军舰岛”，作为日本强征劳工的史鉴之地、记

右图：纽伦堡审判的600号法庭如今保存完好。
摄影 / 陶赋雯



忆之所，却通过媒介传播与变形，使得形象发生了多重变奏。她写道：“‘据日本外务省战后公布资料显示，二战期间，曾有近4万人被强征至日本，其中3700多人在三菱公司旗下的各工厂煤矿强制劳动，造成722人死亡。’国际劳工组织于1999年将日本的强制动员判定为违反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公约《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》，对其历史上的罪恶有明确的指认，认为是违反劳动公约的行为。然而这段本该被永远铭记的历史，却被‘肇事者’日本政府刻意遗忘，并凭借‘高超’的历史包装策略，将‘军舰岛’以日本明治工业遗址身份申报为‘世界文化遗产’。”

在陶赋雯看来，日本政府通过景观记忆、遗产记忆、情感记忆等记忆转向，试图遗忘并掩盖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邻国侵略与剥削的罪行，从而完成形象重塑和记忆抛光。“纵观历史捭阖，

当代日本与亚洲邻国的现实矛盾也往往以其侵略历史为背景，因未能较好地清算近现代史留下的‘负资产’所致！”

陶赋雯记得，自己到东京寻访巢鸭监狱旧址。如今这地方是东京池袋商业设施“阳光城”。

“真是一点儿也找不到东京审判的痕迹，连一个碑都没有，也没有提到过一句麦克阿瑟。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”陶赋雯说，自己索性摸索到大厦内部，却看到这一已经私有化的大厦内部依旧什么都没有，反正她没有找寻到任何历史痕迹。她认为，这就是日本处心积虑将所有相关历史痕迹抹去的结果。而在日本热海兴亚观音寺，陶赋雯曾看到这一为纪念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、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之地，放着可随意领取的为战犯歌功颂德的书面材料。“可以说，东京审判完成了法庭审理，也似乎完成了判决，相关人等也负了刑责，